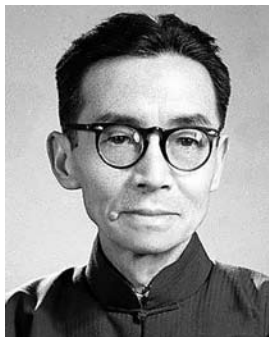


【苏式建筑在新中国②】

LIANGSICHENG YU
DA WUDING JIANZHU

梁思成与“大屋顶”建筑

文_林与舟



— 梁思成，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推广和诠释苏联建筑理论，倡导“民族形式”建筑理论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同时也推动了“大屋顶”建筑在中国的盛行一时。

每当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出来，我们都会看到周围的建筑有一种奇怪的风格：这些建筑都很高大、很现代，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顶部加上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大屋顶”，或者在立面用覆着琉璃瓦的屋檐进行装饰。很明显，这些细部的设计是为了与北京站和北京西站这两座主体建筑相协调：建成于1958年的北京站，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口，而1996年竣工的北京西站本身就是中国古典的城关式建筑的现代翻版。除了这两座车站，我们在北京的很多地方，甚至是全国的很多城市，都能够看到这种建设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仿古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学界，它被称为“大屋顶”样式。

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记得，“大屋顶”建筑曾在1953到1954年间在全国盛行一时，但随即便在1955年初开始的“反浪费运动”中受到严厉批评与抵制，与此同时，“大屋顶”也与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的名字联系起来，以至于现在有的人一看到“大屋顶”的屋子，就会认为是梁思成设计的。

那么，20世纪50年代，这种“大屋顶”建筑缘何从被大力推崇到大肆批判，梁思成在此时的学术沉浮与“大屋顶”跌宕起伏的命运有何关联，而其中，政治外交与苏联建筑理论思想又起到了怎样的化学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将会一一谈到的。

— 苏联建筑理论的输入与梁思成的倡导——“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

1949年新中国成立，由于国际形势的制约，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与建筑思想的输入对中国建筑创作发展起到了直接的影响。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他们在中国提倡苏联的建筑理论，即“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作为老大哥，他们的理论影响了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民族形式”的理论。

在此期间，梁思成无疑成为推广和诠释苏联建筑理论最为积极有力的中国建筑师，作为在



— 人民大会堂，是为迎接国庆十周年，突出社会主义国家的气度，中央政府决定在首都兴建的十大建筑之一，同时也是1958年到1959年，在新中国掀起第三次高潮的“大屋顶”建筑的代表作品。

建筑界享有崇高声望并受中共赏识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也有机会亲自到苏联去深入了解什么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梁思成到苏联访问，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塔什干、新西比等城市，接触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苏联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等四十多位建筑界、美术界、哲学界的权威人士，他们都大力赞赏“民族形式”的建筑。建筑科学院院长莫尔德维诺夫多次接待梁思成，陪同他一起参观，还详细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内容”的内涵：“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关心劳动人民的幸福，关心他们物质和精神上不断提高的需要，在设计中去满足它。”

梁思成认为苏联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建筑中反映社会主义风貌和民族风格。对于民族形式的重视，是苏联建筑和城市在外形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并且正因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按照这样一种民族的形式来建造，所以使这两座城市的市容显得和谐而一体化，不同于当时西方国家城市建筑风格各异、杂乱无章的情况。这是梁思成颇为欣赏的。同时，苏联还重视应用各

民族遗留下来的建筑遗产。

梁思成在认真考虑后，认为在当时学习“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苏联经验是可行的。因为当时“一边倒”不倾向于学习西方的建筑经验，并且西方国家城市有很多杂乱无章的缺陷，还应尽量避免，因此探讨“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是必要的。1951年至1954年间，梁思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宣传苏联的经验和“民族形式”的理论，目的在于总结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以指导中国，以指导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设计。其中，最全面的是在1954年《建筑学报》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国建筑的特征”。该文将中国建筑的特征概括为九点，即单体建筑的三段构成，以院落组织的对称建筑平面，木结构体系，斗拱，举折，屋顶，色彩和细部装饰，梁柱交接的露头和雕刻处理，以及琉璃砖瓦、木雕、石雕、砖雕等特殊构件。在这篇文章里梁思成还提出了“可译性”，指出可以通过将西方古典建筑的构成和构件替换成中国传统建筑的构成和构件，将它们“翻译”为中国式的建筑。在这篇文章和之前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讲话

中，梁思成将其总结出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比作语言中的“文法”以强调其重要性，提出“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创造出他们所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则……只要它们是中国建筑，它们就必是遵守着一定的中国建筑文法的”以及“我们若想用我们自己建筑上优良传统来建造适合今天我们新中国的建筑，我们必须首先熟悉自己建筑上的‘文法’和‘词汇’，否则我们是不可能写出一篇中国‘文章’的。”同时，他还把宋代《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介绍给建筑师作为设计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参考。

— 梁思成推动下“民族形式”建筑理论的设计实践——“大屋顶”

应该说，“民族形式”的建筑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模仿苏联。但如何体现“民族形式”呢？不少建筑师们在体会和运用这一理论时出了问题。

当时的中国建筑师，大多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学成的，那时的建筑教育基本放弃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教学，教学内容几乎都是欧美的建筑体系。因此，建筑师们的“民族形式”的建筑知识较为匮乏，并且建筑规格是围绕着庭院建成的不超过两层的建筑物，而在需要扩展时也只是在地面水平上加些别的建筑。仅有的较大规模的建筑都是皇家的宫殿和陵墓以及佛家、儒家的或其他的寺庙。而现在需要的是能作为机关办事处、职工宿舍、学生宿舍等容量大且向高空发展的大房子，如何吸收这些民族特色？建筑师们在当时没有足够的钻研时间，常常简单地模仿宫殿建筑，建造了不少“大屋顶”建筑。因此，“大屋顶”很快风行全国。

何谓“大屋顶”？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侯兆年在《北京近百年建筑三次“大屋顶”高潮综述》一文中，对“大屋顶”建筑进行了定义，并梳理了这种建筑样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为人们俗称的大屋顶，就是具备近现代功能的仿中国

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也称为‘民族形式建筑’。其特点是建筑带有曲线和较大出檐的大屋顶，立面用中国传统红柱子竖向分割，屋檐下有梁枋、彩画和斗拱造型，基础有块石台基和汉白玉栏杆，建筑材料、结构和功能却是近现代的。”“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构成部分。除了泄雨、保暖等实用目的之外，“大屋顶”还具有其自身的政治功能。屋顶样式的不同体现了社会等级的不同。皇宫建筑的屋顶之大远远超出了建筑上的实用性，其目的正是要体现出皇权的至高无上。民国成立之后，旧有的等级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正当性，然而“大屋顶”的建筑并没有就此立即成为“糟粕”，很多西方的建筑师进入中国，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美感，自觉将这种风格运用到自己的实践当中去，创作了很多如上定义所述的“大屋顶”建筑。比如在上海和南京，20世纪20年代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监造了几座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

子。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的中国特色。

“大屋顶”的盛行固然与当时经济不发达、建筑师们还处于探索的起始阶段有关，然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其与苏联专家的力推亦密不可分。由于政治上的“一边倒”，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学习苏联的建筑理念。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认为，现在不能像“五四”那样，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因此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由于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上得以大量介入，“事实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因为“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体现。

关于“大屋顶”，梁思成的努力也

不可忽视，但事实上，梁思成对这种“大屋顶”的看法有过极大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梁思成都是作为复兴传统式建筑的批判者存在，从而对这种房子一直是不满意的，对于这种不协调的房子，梁思成曾批评为“穿西装戴瓜皮帽”。在1944年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认为这类建筑“颇呈露出其设计人对于我国建筑之缺乏了解，如（北平）协和医学院与（成都）华西大学，仅以洋房而冠以中式屋顶而已”。他多次强调要尽量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我们的原有基础，不要抄袭和模仿，而他跟林徽因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则力求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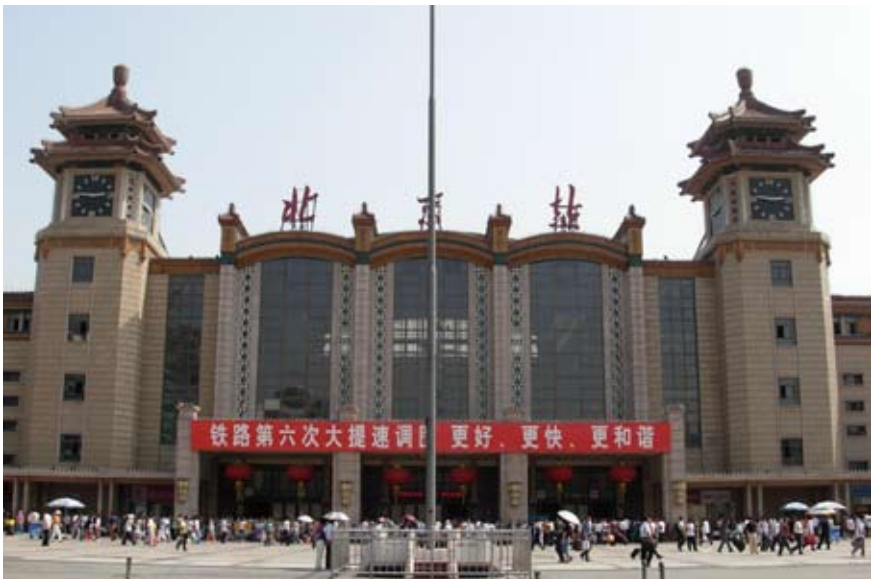
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成为这一传统建筑的捍卫者。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梁思成对传统建筑元素的推崇：“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但是百余年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它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玻璃匣子。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最近由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他还明确表示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则的赞同：“我们将来的建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呢？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

化’一节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们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然而，在主动追求民族建筑风格之外，梁思成坚持“大屋顶”设计还与自己的“梁陈方案”被否定有关。王军先生在《城记》中考证，对“大屋顶”的坚持实际上是梁思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在“梁陈方案”中，梁思成提出在旧城西侧发展新的行政中心。由于这样能够使故都完整保存下来，新的行政中心就不用太受到建筑风格和高度的限制，可以进行较为自由的创造。然而，这一方案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定。在一切“一边倒”的背景下，中央部门涌入旧城，甚至要布局在长安街的两侧。这样一来，故宫等文化遗产的周围景观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如果未经精心规划，这种变动很可能是负面的。为了防止新建筑与古建筑争高，破坏故都的天际线，梁思成与林徽因力主内城的新建筑不能高过三层。并且，为了与天安门调和，还必须加上“大屋顶”。然而，这种纯美学的考虑被苏联专家否定了，因为根据莫斯科的经验，将楼层高度控制在五到九层是最划算的，这样一来可以最充分利用土地面积和基础设施。因此，梁思成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取得胜利。最后，梁思成在考察莫斯科之后发现，如果经过精心的规划，让新建筑在外轮廓上与周围旧景物协调，也可以适当放

开高度的限制。因此，一退再退之下，梁思成最终将底线放在了“大屋顶”上，并就这个主张进行积极的活动。一份材料显示：“照梁思成看，建筑物不论什么地点，也不论什么性质，都必须用大屋顶：东单的几个部，在审查建筑图样时，他建议各部加大屋顶，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没同意，贸易部迁就了，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在他看，天安门广场周围，就更要“大屋顶”了，理由是不然与周围环境不调和。公安部的‘大屋顶’，就是他强制加上的，据公安部说他们因此少建了四十多间房，而且搞的样子很难看，就连梁思成自己也承认只值两分……他曾固执地对我说：‘虽然只值两分，但设计的方向是正确的。’”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他还想象着设计了一座高约35层的大厦，所采用的正是“大屋顶”样式。而他认为，“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这个大厦虽然是想象中的，但在形式上，却与后来的民族文化宫非常相似。

——“反浪费运动”：中央对“大屋顶”建筑的否定及对梁思成的批判

然而，梁思成对“大屋顶”设计的坚持很快就遭到了反击，而这反击并不完全是从中国内部发起的，苏联方面的新动作又成为了主要的动因。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立即对过去的建筑思想进行了纠正。在1954年11月苏联第二次全苏建筑工作者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论在建筑中广泛采用工业化方法，改善质量和降低造价》的报告，在苏联建筑界掀起了批判复古主义的浪潮。很多在斯大林时期坚持“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人又



——北京火车站。其立面用四个重檐攒尖的清宫式亭子装饰钟楼和东、西出入口站口。为建设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仿古建筑，在中国的建筑学界，被称为“大屋顶”样式。



— 北京协和医院。它是西方建筑师设计的中国传统复兴式（也称“宫殿式”）建筑的第一个成熟作品，同时也是典型的“大屋顶”建筑。

反过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且在建筑中浪费了大量不合适的资源，这与人民的利益不相符合。借着这个机会，中国政府对于梁思成积累起来的不满也爆发了出来。

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会上报告了近几年来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和设计中导致浪费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大屋顶”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全国范围内的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这次批判是针对梁思成的，尽管他的理论是没有错误的，建筑实践中的错误也不应该由他承担，但梁思成就这样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唯美主义的代表。或许这还与他总强调古城墙城楼的美，和“大众”站在对立面，违反最高领导的意志有关吧。

对于这次批判，梁思成曾说：“我的烦恼是‘党什么都好，就是可惜不懂建筑’。‘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开始犯错误了。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想搞一个

在建筑领域中的反党活动。我写文章、做报告，系统地做学术演讲，并且以我的理论教育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反对美国式的玻璃方匣子，我有意识地搬用了毛主席的话‘矫枉必须过正’，所以为了矫方匣子之枉，必须过正地去搞复古主义。我想搞成一个学派，以群众的压力来‘教育’党的领导同志。我的错误理论在全国范围内影响了不少建筑师，造成巨大浪费。正如一位领导同志后来告诉我说，连许多共产党员都被我‘俘虏’了。正在我暗暗高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突然成了全国性的批判对象。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心情非常沉重。”这是梁思成的心里话，他承认了自己的理论导致浪费的错误，但并不承认“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猜测，“大屋顶”借口反对浪费国家资材而开展的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讨论的延续。和当时的许多文化批判一样，文化并非讨

论的内涵，甚至根本不是讨论的内容。需要的是取代，是从根底上动摇所有领域中权威者的文化信念。最便利的办法，莫过于以不可反驳的气势压倒被批判者，将人的文化思维引到一种既定的政治目标上来。“大屋顶”的批判其实是对梁思成保护古城思想批判的延续，否定了梁思成，批判了梁思成，直接的后果是北京古城不可避免的浩劫。

这是梁思成与“大屋顶”的故事。可以说，梁思成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风格是没有错的，这一点，他也始终认定。只是建筑师在贯彻这一思想时建造的建筑不尽如人意。然而，从今天看来，“大屋顶”并非一无是处，虽然它“浪费”了建筑材料，但它仍不失于美观，并且反映了民族特色，比一味模仿欧美的建筑要好得多。同时，这是探索民族形式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在探索阶段，付出点代价也是很正常的。🏠